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10.009

[澳]于镭:“澳大利亚近年来连续阻挠我重大投资的原因探析及我因应之策”,《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0期,第97-104页。

YU Lei, “Australia's Veto on Large-scale Chinese Investment and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10, 2017, pp.97-104.

澳大利亚近年来连续阻挠我重大投资的原因探析及我因应之策

[澳]于 镭¹

(1.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否决我数起重大投资,既予我企业以经济损失,同时又在澳抹黑我国家形象。澳逆其经济困难形势而动,以双重标准待我投资的无理行为既有美日益加大压力的外生性,又有国内政治斗争激化的内生性。由于国弱民寡,澳自独立之日即奉行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以获取经济利益和安全庇护。在从澳美同盟获利的同时,澳也不得不对美效忠,并甘为其驱使。此外,澳国内右翼亲美保守势力强大,现政府执政地位异常脆弱,这导致政府在决策时往往面临国内保守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因此不排除澳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阻挠我对澳重大投资的可能性。

关键词:澳双重标准;中国投资;澳美同盟;右翼势力;政策建言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10-0097-08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以来,中澳经贸关系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迅猛。据澳外交与外贸部统计,2015年,我继续蝉联澳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1500亿美元,接近澳美、澳日之和;二是双向投资发生根本性逆转,呈现出中国对澳投资大幅度反超的现象。2015年,我对澳直接投资达300亿美元,是澳对我投资额的两倍半,澳已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我国第二大海外投资目的地。^①我对澳投

资的飙升拉升了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对澳经济繁荣、就业稳定和人民福祉贡献巨大。澳国内金融市场狭小,资金相对匮乏,外资对澳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据澳方估测,至2020年,若外资增加10%,则GDP增长率将增加1.2%,就业率增加0.3%,工资增加1.1%。^②

尽管外资对澳国计民生意义重大,但长期以来,澳对我投资始终实行歧视性双重标准。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后,情况虽有好转,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2015年,澳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我企业竞购澳电网公司;2016年4月,澳再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我收购澳最大的牛肉企业;8

收稿日期:2016-08-27;修订日期:2017-08-26。

作者简介:于镭(1970—),男,澳大利亚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澳关系、澳美关系。

①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hina Fact Sheet”, 2015, p.1.

②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cy Division of Australia Treasury, “Treasury Working Paper: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Australia”, 2016, p. 3.

月初,澳财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第三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我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对澳电网的竞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澳连番阻我大型投资活动不仅在全球罕见,而且发生在澳经济下行、资金匮乏、民生日艰之际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某些澳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并非是经济蹇困的澳“不差钱”,而是某些人脑子里的冷战思维在政治化、妖魔化中国投资。^①

本文根据澳近年来的外交与内政态势,深刻发掘澳连续否决我对澳重大投资的决策的外生性和内生性。外生性在于澳大利亚无法罔顾美国对中澳走近的警告,否则后果为澳无法承受之重:“若澳在中美冲突中不能坚定地站在美一边,那就意味着美澳同盟的终结”,澳从此不再受美庇护。^②内生性在于特恩布尔新政府执政地位异常脆弱,若不对国内强大的右倾保守势力妥协,并寻求其支持,新政府可能一天也无法维持。鉴此,本文强调指出,随着澳美军事同盟的强化和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的增加,以及澳国内右倾保守势力的抬头,不排除澳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对我大型商业投资采取歧视性双重标准,并就此提出我因应之策。

二、澳对我投资的歧视性双重标准的外生性

长期以来,澳因其法律健全、市场规范、资源丰富而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日、英、德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目的地。为了规范海外投资行为,审查其投资是否影响到本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澳政府于1976年成立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性质为非政府组织,由3名兼职委员和1名财政部指任专职委员组成,负责审查外国投资申请,并向财政部提交参考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只有建议权,外国投资批准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则在财政部。由此可见,外国投资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完全由澳政府决定。

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千年后,我对澳

投资日益增多,但澳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我投资采取歧视性双重标准。澳大利亚西澳州州长巴奈特(Colin Barnett)曾披露说: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10亿澳元以下的美资免检放行,而中国民企免检额只能在2.58亿澳元以下,国企则是每一钱投资都须审查。^③前总理阿伯特(Tony Abbott)上台后,囿于澳经济发展乏力,海外投资减少,加之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缔结,对我在澳投资控制有所松动。但是,新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执政后,再次收紧对我投资审查。究其原因,顾忌美国压力,迎合美国战略目标,巩固澳美军事同盟是澳连番否决我重大投资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澳建国百年,始终将“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策略视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这一立国之策在澳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长期以来,它不仅深受澳政坛左、中、右各派追捧,而且在澳普通民众中也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

西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Morgenthau)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学》(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明确指出:“国际政治如同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对权力的争夺。”^④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一国在全球权力体系里的地缘政治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一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功能性结果。^⑤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当今的全球权力体系架构即是各国“硬、软”实力的产物,各国的“硬、软”实力也决定了他们在全世界体系和地区

① James Laurenceson, “Hawks Have Poor Record on Chinese Security Threat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http://www.afr.com/news/world/asia/ausgrid-hawks-have-poor-record-on-chinese-security-threats-20160808-gqn15s>.

② Michael Wesley, *Australia as An Asia-Pacific Region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7, p.217.

③ Graeme Powell, “Barnett Says Chinese Investors Discriminated against”,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6-05/barnett-says-firb-rules-discriminate-against-china/4733904>.

④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Press, 1966, p.12.

⑤ Shamsul Khan, “Middle Powers and the Dynamics of Power Shift”, *Harvard Asian Quarterly*, Vol.XIV, No.3, 2012, p.52.

次体系中的地位。^① 根据各国的“硬、软”实力,西方学者大体上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超级大国(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中等强国(地区性强国,全球体系或地区次体系中的重要国家)和底层国家(全球体系和地区次体系里的弱国)。

超级大国具有区域强国和底层国家无法企及的“硬、软”实力,因此它往往凭借自身实力对不服从自己意志的国家采取形象抹黑与妖魔化、经济制裁与贸易禁运、军事封锁与入侵颠覆等手段予以惩罚,并以倣效尤,从而达到增强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中威权的效果。中等强国和底层国家由于自身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实力等因素不具备逆向或等量逆向作用的能力。因此,从国际关系的互动架构来看,超级大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相对处于“主导”地位,而中等强国和底层国家则通常处于“从属”地位。^②

面对全球权力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超级大国的庞大实力,中等强国若非“硬、软”实力强大,特别是若不希望因经济和军事基础“硬实力”地快速扩张挑战守成超级大国的权力地位,通常会以与超级大国保持密切合作乃至结为同盟为其首要战略目标,借助与超级大国的密切关系提升自身的国际“声望”,谋取经济福利,并借力超级大国保卫国家安全,吓阻挑战者,维护并巩固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的强国地位与既得利益。作为回报,中等强国需对超级大国表现忠心,承担协助超级大国维护全球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现状的义务。中等强国往往对承担这一义务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因为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有可能客观上调整现有的权力架构体系和利益分配。因此,协助超级大国打压新兴大国,就是维护自身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在这一点上,超级大国与中等强国在维护全球特别是新兴大国所在区域的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的现状上,有着颇为相似的战略利益。^③

澳大利亚自1900年独立以来,一直以与超级大国建立联盟为立国之策和构建中等强国的路径。澳四面临海,地广人稀,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自给能力极其薄弱,海外贸易遂为其

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因此,如何抵御外来入侵,保护海上生命线一直是澳政府各界最为担忧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图存图强”的背景下,与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相近的新兴超级大国美国结盟的“孟菲斯”主义在澳日益盛行,成为影响澳外交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客观地分析,澳美同盟确实为澳带来了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谓的“高端政治(国家安全)与低端政治(经济福利)利益”的双丰收。首先,澳美同盟为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安全保障,它不仅成功地于二战初期抵御了日本对澳北部领土的狂轰滥炸,令日本侵略军知难而退,而且吓阻了澳臆想中其他亚洲邻国对澳领土的觊觎,为澳这个生活在“亚洲丛林”中的白人国家提供了现实与心理的安全保障。其次,澳美同盟为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福祉。大量美资的涌入,美国市场的对澳开放,美国先进技术的进入令澳经济在二战后快速发展,并成功地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再次,美澳同盟的巩固也令美放心大胆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扶持澳,助其实现梦寐以求的成为亚太地区“中等强国”的百年“澳洲梦”。

但是,正如亘古不变的哲理所言,有收获就必须得付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明显超越英国的二十世纪初,澳即与美结盟,并随后追随美国参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有美国参与或发动的战争。^④ 即使是像越战这样在西方广为诟病的战争,在英国、加拿大和《澳新美条约》三成员国之一的新西兰拒绝参战的情况下,澳也义无反顾地追随美国参战,并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表现出对美国的耿耿忠心。冷战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了历史巅峰,澳对美国的态度更是亦步亦

① Shamsul Khan, "Middle Powers and the Dynamics of Power Shift", *Harvard Asian Quarterly*, Vol. XIV, No. 3, 2012, p. 52.

② Baldev R. Nayar, "A World Role: The Dialectics of Purpose and Power", in *India: A Rising Middle Power*, ed. Boulder Mellor Press, 1979, pp. 117-145.

③ 于镭、[澳]萨姆苏尔·康:“‘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第49-60页。

④ Josh Frydenberg, "Washington Is Integral to Our Region", *the Australian*, Sept. 21, 2010, p. 8.

趋,紧紧追随。澳霍华德(John Howard)总理1996年上台伊始就不遗余力地为美国于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军事同盟即所谓的“轮辐体系(又称旧金山体系)”大唱赞歌,并一再宣扬澳美同盟是澳对外政策的基石。为了表现对美国的忠心,霍华德不顾国内外的反对,高调支持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并率先在澳部署。霍华德这种对美国亦步亦趋的追随举动即便在美国的西方盟友中也实属罕见。霍华德政府的外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在澳部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体现对美国的“忠诚”,“强化与华盛顿的军事同盟”。^①

1999年,澳政府又发布“霍华德主义”,声称澳将更加积极地在亚太地区扮演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和价值观的“副警长”角色,必要时将对亚洲邻国采取军事干预。^②澳学者广泛认为霍华德主义表明澳政府不仅要在亚太地区捍卫美国主导下的区域秩序,保护美国的利益存在,而且要不顾亚洲邻国的意愿和亚太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执意扩大西方价值观。^③霍华德主义因此被亚洲邻国认为是专门针对亚洲的澳版“新干涉主义”。鉴此,霍华德主义一出笼即遭到了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亚洲邻国的广泛批评。香港的《亚洲时报》批评说:“霍华德主义让澳承担了没有亚洲国家欢迎,却广为批评的义务”。^④当小布什总统咄咄逼人地宣布实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时,包括许多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不安。但是澳政府又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即便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也在所不惜。霍华德之后的澳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和阿伯特执政时间均不长,多则三年,少则两年。但是在他们执政期间,美澳军事同盟关系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澳美同盟不仅为澳带来了安全利益,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自我国于2009年跃升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澳国内各界

持续辩论,究竟中美哪一方在经济领域对澳更为重要。出乎许多中国专家学者的意料,澳各方经过比中美两国对澳经济生活的影响指数,普遍倾向于认为美在现阶段仍然是澳“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截止到2014年底,美对澳投资额高达7500多亿澳元,是中国对澳投资额的11倍,这意味着美国资本已经深入到澳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⑤美国投资人实际上是澳许多大型矿山和企业的最大股东,对澳经济稳定与发展,以及普通民众的就业影响殊巨。例如,澳最大的本土品牌汽车霍顿(HOLDEN)的投资人实为美商。该车在澳存在历史悠久,并且仅在阿德莱德一地就雇佣了数千名当地工人。因此,当该汽车厂宣布破产关闭时,在全澳引起极大震动。正是由于美资对澳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澳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才在国会和对媒体讲话时,一再提醒议员和选民,美国才是澳“唯一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是澳对外关系的基石。^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坚持奉行全球体系超级大国“铁杆”追随者的战略,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完全是基于澳美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相似性,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考量。通过一个多世纪持之以恒地演绎“能力有大小,态度是关键”的“活报剧”,澳对美的忠心获得了美国的高度肯定,被美誉为“最忠诚可靠的盟友”,澳既为

① New York Times, “Australia to Join U.S. Missile-Defense System”, Dec. 4,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12/04/world/australia-to-join-us-missile-defense-system.html>.

② William Tow, “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u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mbiguous World Order”, *Pacific Review*, Vol.17, No.2, 2004, pp.271-90.

③ William Tow,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China Growing Strong: Managing Conflict Avoid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5, No.1, 2001, pp.37-54.

④ Asian Times, “Deputy Sheriff Howard Rides into Town”, <http://www.atimes.com/oceania/A128Ah01.html>.

⑤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Fact Sh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dfat.gov.au/trade/resources/Documents/usa.pdf>.

⑥ Julie Bishop, US-Australia: The Alliance in An Emerging Asia,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ttp://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4/jb_sp_140122.aspx?ministerid=4.

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因此收获了高额的利益回报。近一年来,澳屡屡否决我对澳大型投资也正是基于巩固澳美同盟和美国施压的考虑。2016年初,在获悉我企业租赁澳北部重镇达尔文港后,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怒不可遏,当面要求澳新总理特恩布尔“以后必须提前通知美国中国类似的投资”。对于奥巴马的不悦,特恩布尔一再保证“必要时,澳国防部和政府都会接管达尔文港”^①。美国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负责人安德鲁·克里派恩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在澳最大媒体《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一语泄露了奥巴马不悦的“天机”：“该交易最坏之处在于它在美国倾力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时,损害了美国对澳美同盟的信任”^②。奥巴马“教训”特恩布尔后,澳政府即以安全为由,否决我企业并购附近农场。在某些澳政客看来,否决中国对澳大型投资虽然与澳国家安全无关,但确是为了防止中国在澳美特殊关系间再钉入一枚离间的楔子。

但是,从澳英同盟到澳美同盟“与时俱进”的演变,也同样印证了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同盟国间关系的断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利益所向,亦即澳忠心所向。当外部利益大到无法抗拒时,盟友间所谓的道义、友谊和忠诚其实都是“浮云”。

三、澳对我投资的歧视性双重标准的政策内生性

顾忌国内政治压力,迎合保守势力,巩固联盟执政地位是澳新政府连番否决我重大投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2016年7月,澳提前举行大选,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以微弱优势险胜,这意味着特恩布尔连任后面临巨大的执政压力。特恩布尔必须通过拉拢右翼小党和独立参议员,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并进而推动其倡导的国内经济改革和创新,挽救日益下滑的澳经济。自冷战以来,澳国内政治一直偏右,保守势力异常强大,这主要表现在固守冷战思维、支持

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并提出要做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副警长”。东欧巨变、苏联垮台更加助长了澳国内保守势力的气焰。澳敢于在90年代台海危机、新世纪初中美撞机等事件中单独跳出,“一边倒”地支持美国,以及在台湾、西藏、新疆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股势力的嚣张。

尽管新世纪以来,我综合国力发展日新月异,中澳经贸合作日趋紧密,澳民众对我认知日益改善,但澳社会上层,特别是政界、安全防务界、乃至政治学术界的保守势力仍旧强大,不时发出有悖中澳关系健康发展的杂音。“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的奇谈怪论在这些“圈子里”不时沉渣泛起。随着我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防现代化的加速,澳保守势力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鼓吹加强澳美同盟,共同遏制中国。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军在澳军事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战略性目标也越来越有针对性。二是美澳在亚太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机制化,规模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冷战时期都很少出现的逾万人的联合军演在今日的亚太地区却是频频出现。三是美、日、澳在亚太区域军事联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一势头还有进一步扩大到印度洋呈现印太合流的态势。四是尽管澳目前经济下滑,财政困难,政府却不断削减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军费,剑锋所指,不言自明。

陆克文执政时期,澳政府即发布《国防白皮书》,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公开指认中国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经济整体不景气之际,陆克文竟然私下鼓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要对中国“强硬”,甚至向美国建言:“西

① Peta Donald, “Let Us Know Next Time: Obama to Turnbull on Darwin Port Lease”, <http://www.abc.net.au/worldtoday/content/2015/s4355269.htm>.

② Jonathan Pearlman, “US Alarm over Aussie Port Deal with China Firm”, *Strait Times*, Nov. 19, 2015, <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australian/us-alarm-over-aussie-port-deal-with-china-firm>.

方要准备对华动武。”^①在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后,吉拉德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回应,直言不讳地表示澳愿做美军的亚太前进基地。澳政府不仅扩大美军在澳军事基地的规模,而且成建制地部署美海军陆战队,并实质性提升美澳军演的质量。尽管吉拉德极力将上述军事行动粉饰为承担“国际人道主义使命”,澳许多学者指出这是一个根本无法令人信服的低级借口,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实际上是美澳联手遏制中国崛起,因为“人们无法理解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会在人道主义使命中发挥什么作用”^②。在阿伯特当政期间,澳、美、日在亚太地区军事合流的势头加速。澳美不仅在该地区第一次举行了有上万名士兵和百余艘军舰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而且日本也首次派兵参演。澳外长毕晓普在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坚称美是澳“最伟大的盟友”,而日本是澳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正是基于对美国这个所谓“最伟大的盟友”的“忠诚”,毕晓普才追随美国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发表一些甚至连澳学者都认为“有失公允”的言论。

新首相特恩布尔上台后即声称:“我们生活的亚太地区比以往更富挑战性,我们必须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③尽管特恩布尔没有具体言明他心中所谓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澳随后发表的2016年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了这就是“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安”^④。该白皮书声称到2021年,澳将花费1950亿澳元用于扩充军备,购战机,造潜艇,强化澳作为美军亚太军事“南锚”的军事地位。澳最大的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为此评论说:政府已铁了心大幅度增加军费,即使损害宏观经济健康也在所不惜。^⑤在大幅度增加军费的同时,2016年4月澳派遣军事人员和AP-3C军机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军演不仅规模空前,有一万多名士兵参演,而且美国在亚太的“北锚”日本也派出包括潜艇在内的武装力量参演,显示出美、日、澳在亚太地区“合流”的趋势。参演的澳军指挥官直言不讳地表示,澳军参演就是要向美表示澳将在本地

区与美国共同行动的决心。^⑥

在经济领域,澳保守势力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向政府施压,对我在澳投资采取歧视性双重标准。澳前总理阿伯特在2012年以反对党领袖身份访华时,曾公开声称我在澳投资“令人不安”。虽然目前我对澳累积投资额仅为600亿澳元,不到澳吸引外资总额的1%,且远远落后于美(7582亿澳元)、日(1996亿澳元),^⑦但这些保守势力对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澳关系的日益深化深感“不安”和“恐惧”,一再挑动政府和既得利益群体加强对我投资审查,重点限制我对澳农、矿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澳右翼政客、参议员、一族党党首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不断地在澳媒体散布危言耸听的言论,担忧中国借投资之便控制澳的电网。^⑧这些右翼势力“逢中必反”,时常纠集起来,致函总理、财政部长,甚至是澳相关并购的企业领导人,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商业投资。

① BBC News, “Australian PM Kevin Rudd Sought Tough China Policy”,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1925438>.

② Australian, “US Seeks Deeper Military Ties”,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defence/us-seeks-deeper-military-ties/story-e6frg8yo-1226311869939>.

③ Andrew Greene, “Malcolm Turnbull Sticks to Tony Abbott's Defence Spending Pledges in Long-awaited White Paper”,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2-23/defence-white-paper-turnbull-sticks-to-abbott-pledges/7194480>.

④ 同③。

⑤ Greg Jennett, “Defence White Paper: Australia Joins Asia's Arms Race with Spending on Weaponry and Military Forces to Reach \$195b”,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2-25/defence-white-paper-released-increased-spending/7198632>.

⑥ Lindsay Murdoch, “South China Sea: Australia Involved in Balikatan War Games amid Warnings”, 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 5, 2016, <http://www.smh.com.au/world/south-china-sea-australia-involved-in-balikatan-war-games-under-chinas-nose-20160405-gnyp1f.html#ixzz4AO7fsLOW>.

⑦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United States Fact Sheet; Japan Fact Sheet”, 2015, p.1.

⑧ Sean Nicholls, “Pauline Hanson's Message to Scott Morrison: ‘Don't Sell Ausgrid’”,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 30, 2016, <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news/pauline-hansons-message-to-scott-morrison-dont-sell-ausgrid-20160729-gqgwjp.html>.

四、对澳歧视性双重标准的因应之策

鉴于澳近年的外交与内政走势及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为外部因素和内部政治因素所左右,不排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澳政府仍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我在澳投资,特别是大型投资活动。尽管澳政府对我歧视性投资审查标准在经济层面上是损人害己的双输决策,但它迎合了美国 and 国内右翼保守势力,未尝不是现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优选。但是澳财政部的最终决定对我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不仅令我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还在更大的澳国内和国际层面上起到恶劣的示范效应,增大我企业走出去的难度。鉴此,我们不妨做出以下因应之策。

一、借鉴信用评估制度,建立投资预警机制。可考虑由工商联,或企业家联合会等著名民间机构创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并重点发布包括澳在内的我海外投资重大目的地的投资风险警示,引导我企业规避风险。该机制主导机构亦可名正言顺地主动联系澳财政部、外资审查委员会等机构,要求其提供澳相关政策、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资料,发挥沟通、交流和指导我企业投资等作用。警示机制可对澳形成机制化、常态化的压力,改变目前澳政府故意作出错误决策却不受惩罚,而由我受害企业“买单”的不合理局面。澳国内经济必须为澳政府的错误决策承担后果,付出代价,从而约束其干扰我正常商业投资的决策随意性和政治投机性。

二、改进投资组合,包容澳利益集团,分化不友好势力。虽然澳市场成熟、法规完善,但澳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垄断现象严重,各行各业均为利益集团所控制。这些利益集团能量巨大,往往与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操纵舆论。我企业在澳投资往往习惯“单干”,没有照顾这些垄断集团的利益,因此,无论是在政府审查程序上,还是在当地舆论导向上,均易受到澳利益集团和不友好势力的联合阻挠。鉴于此,我企业似可

改变思路,优化投资组合,邀请澳企共同投资,互利多赢。这样既可增加通过政府审查的胜算,亦可减少或消除当地阻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三、深耕中澳民间贸易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在澳培育公正、友好的经贸合作氛围。澳是“圈子型”社会,各行各业,乃至每个行业的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一旦利益受损或受到威胁,整个“圈子”都会集体发声,对政府和社会产生强大压力。目前,英、美、德和波兰的商会都非常重视与澳政府和社会各界公关,对政府和媒体有相当的影响力。我虽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澳社会影响力与上述各国仍有不小差距。因此,亟需推动我民间经贸机构,如贸促会、企业家联合会等,与澳各界特别是商界深耕合作,培育行之有效的“共同利益圈”,推动他们为双方在澳创立公正、友好的经贸合作氛围而共同发声。

四、加强澳国内法研究,鼓励企业用法律武器维权。澳一向自我标榜为法治社会,其法律体系也确实成熟完善。鉴于澳政府一再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损害我利益,我有关学术机构和民间经贸组织不妨对我海外投资企业多予以法律援助,鼓励他们借鉴三一集团经验,^①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声誉。不论法律维权的最终结果如何,都会迫使澳政府公开其决策的依据,增加其“黑箱操作”的难度,加大其经济、政治和国际声誉成本。

编辑 龚 婷 李 亚

^① Steven Mufson, “Obama Administration Denies Chinese Firm Due Process, Appeals Court Rules”, Washington Post, Jul. 15, 2014.

Australia's Veto on Large-scale Chinese Investment and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YU Lei¹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vetoed a series of large-scale Chinese investment with the pretext of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causes enormous economic loss to relevant Chinese enterprises on the one hand, and undermines China’s national im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uble standards” adopt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n Chinese invest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ts economic hardship essentially derived from the growing external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l pressure of its own domestic politics. As a state with relatively humble national strength and small population, Australia has stuck to the strategy of “aligning with a superpower” since its founding in an attempt to secure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tection. In return, it has to proffer its “loyalty” to and commit itself to the interest of the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in Australia, that is, a powerful coalition of pro-American and rightist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context of a weak government, leads to the formidable pres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o face when making a decision. Therefore, the possibility of more vetoes on Chinese investment may hardly be elimina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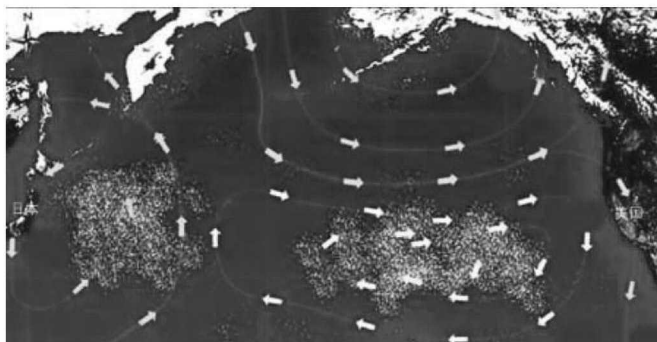
Key words: Australian double standards; Chinese investment; US-Australia alliance; rightist political forc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对海洋“PM2.5”——微塑料说不

2004年,发表在 Science 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出微塑料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微塑料的尺寸还没有共识,但通常认为是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它也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海洋中的“PM2.5”。早在上世纪70年代,科学文献首次提到了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世纪初,随着令人震惊的太平洋“塑料垃圾带”、无处不在的微塑料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潜在影响的报道,社会对海洋塑料垃圾的研究和关注复苏。

2017年7月,我国第8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启航。本次北极科学考察是我国首次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任务,微塑料首次被加入监测项目。这也意味着我国将微塑料监测拓展至亚北极和北极海域。



太平洋塑料垃圾带